



国学研究丛书

華中國學

张勇书题



主 编◎ 罗家祥

2016年·春之卷 (总第六卷)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主持编辑的大型学术集刊,内容包括政治史、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古文字学及古典文学等国学研究的各个分支,涵盖了历史学、文学、哲学、语言学等四个学科,集中展现了海内外国学研究的部分最新学术成果。所选文章多立足学术前沿,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新方法的运用,展现新视角、发明新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水平。

本书主要面向科学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适用于广大文史爱好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中国学. 2016年·春之卷:总第六卷/罗家祥主编.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9
(国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80-1968-2

I. ①华… II. ①罗… III. ①国学-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4931 号

华中国学 2016 年·春之卷(总第六卷)

罗家祥 主编

Huazhong Guoxue 2016 Nian · Chun Zhi Juan

策划编辑:周小方 钱 坤

责任编辑:刘 烨

封面设计:原色设计

责任校对:李 琴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75 插页:2

字 数:461千字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学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邢福义 朱 雷 刘献君 杨叔子 张岂之
张勇传 韩忠学 宗福邦 葛剑雄

主编

罗家祥

副主编

程邦雄 雷家宏 李耀南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鹏 邓小南 华学诚 刘真伦 李传印 杨 果
吴根友 冻国栋 张三夕 赵国华 郭齐勇 黄朴民
黄树先 阎步克 董恩林

执行主编

黄树先 夏增民



总序

General preface

近 30 年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巨大进步，飞速发展的国力提升，迎来了史诗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伟大复兴与飞跃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神州大地蔚为大观的“国学热”，正是在这一宏伟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之所以重新得到如此热烈的关注，原因就在于其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独特价值。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上唯有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风雨坎坷，非但没有消亡，而且从未中断，成为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和智慧源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之所以如此，传统中华文化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中华文化又具有哪些独特价值？以中华原典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子》和《论语》为例，虽然它们具有的价值取向似乎有所不同，即所谓出世与入世，但却有着共同内核，这就是“和”的理念。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这一理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而当代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老子》和《论语》无疑也是最重要的本土的思想宝库。中华文化向来注重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强调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自然一体；讲究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时遵循“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和“守弱居柔”的规律；信守中庸之道，深怀忧患意识以及“不争”与“无为”，“不争”即“天下莫能与之争”的“不争”，“无为”即“无所不为”的“无为”，这些文化特质所表现出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都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生物得到稳定的延续靠的是基因的遗传，又靠基因的变异得到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基因”则是文化。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过去留下的东西就是文化，这里既包括有形的，又包括无形的，人类社会就是靠文化的传承才得以延续，又靠文化的创新才得以进步。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中华文化所凝现的民族精神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哲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产生着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如今，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雄姿迈入 21 世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显得尤为迫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因为一个民族的特性不取决于遗传的自然基因，而是取决于人文文化，只有人文文化才能彰显一个民族的身份。如果一个民族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丢失了自己的传统，那将只是一个种族，不能称之为民族。在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痛苦地受人宰割；然而，没有民族文化，没有人文精神，就会空虚和异化，则会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因此，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就绝没有社会进步，但只有科学技术进步，那这个社会就是很危险的；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很落后，这个社会也是很野蛮落后的；如果一个社会科学技术很进步，而精神文明非常落后，这个社会将是灾难性的。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人文文化是第一生产力的动力源、方向盘。中华民族要全面而迅速地实现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文与传统，其意义不言而喻。

人们可能要问，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能与现代社会兼容？中外无数事例表明，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人文精神和智慧不仅不会与现代社会产生冲突，而且还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奇特的效果，即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也可发挥出巨大作用。日本明治维新后，有一位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一生创办了 500 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金融之王，他 80 多岁退下来之后，在日本财团开办的讲习班上专门讲他如何用《论语》来办企业，堪称毕生将中华文化、《论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华原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巨大作用的经典案例。直至今日，他的五世孙、日本著名的投资者涩泽健还在强调他的哲学名言：“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是利与义多么紧密的结合。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说明，古老的中华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既背靠五千年历史文化，又坚持三个面向。

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民族要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要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拥有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和健全而良好的国民素质就是最基本的前提。在这方面，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认为，人文对科学至少有三大作用。首先，人文为科学发展指引方向。科学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方向完全正确。无数的事例证明，20 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严重负面影响。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需要人文导向，人文的提升当然也需要以科学为基础。其次，人文为科学提供了动力。事实证明，只有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结出符合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之果。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20 世纪享誉中外的我国老一辈科学巨子如华罗庚、苏步

青、茅以升、李国平等以及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丘成桐等在国学方面均有极高的素养，这不仅深刻影响着其人格风貌、精神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在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则将其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直接归因于国学大师胡适。第三，人文为科学开辟原创性源泉。科学讲逻辑，讲分析、解决问题，但科学中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就需要直觉和灵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直觉、灵感、想象力从哪里来？科学教育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更多则来自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可以培养出高尚的人性和高级的灵性，科学创造是离不开人的人文素养的。因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看，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建设当代文化、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已刻不容缓。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近 20 年来在不同场合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对创新的重要性，如在 2006 年 1 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谈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时，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提到中华文化含有丰富的创新内容，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06 年 11 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每一次飞跃、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烙印。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华文化对增强民族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

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纵深发展，社会上许多十分严重的隐忧与显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显得极为重要和空前迫切，而中华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养分则是亟待继承、弘扬的。举例来说，我国几千年来强调信守仁、义、礼、智、信，显然是可以纳入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予以继承和弘扬的。所谓“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当前的诚信建设与道德建设显然特别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何况，通过弘扬优秀中华文化，陶冶国民感情，启迪国民智慧，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其意义非同一般。

以上所讲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与感受。当然，挖掘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并使之产生积极影响，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与共同努力，需要大批专业工作者扎扎实实的辛勤耕耘。同 20 世纪初比，当代意义上的国学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指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而且还应包含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也需要本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更深远的抱负，肩负起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责任和使命，为当代我国的文化建设付出更多的努力。

近 10 年来，我校国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

一道亮丽的学术景观；2009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本学科的发展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值此凝聚着大家心血的《华中国学》问世之际，谨致衷心的祝贺，更寄以深厚的期望！

最后应声明一点，我是一名工科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介入了国学研究之内，然而毕竟大非内行，所讲的不对之处，希望读者特别是本领域专家批评指正，我不胜感谢。

是为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二〇一二年九月一日



前言

Preface

华中科技大学于 2008 年正式发文成立国学研究院后，所有同仁便有一心愿，即编辑出版国学辑刊，使之成为反映国学研究成果的园地。最初的想法是分门别类，逐年一辑。于是，2008 年岁尾，国学研究院即组建国学辑刊编辑委员会，出版过一部主要反映我校历史学研究成果的集子，冠之以“中国历史文化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辑刊第一辑”，由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来经过多次商议，编委会调整了原有思路，遂将辑刊改名为“华中国学”，自 2015 年起，每年春秋各出一卷，为半年刊，篇幅在 20 万字左右；在内容方面，除我校同仁的论文之外，也适当吸纳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收录在这本集子的论文，鉴于目前学界对“国学”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诠释见仁见智，故未按经、史、子、集研究予以分类，也未按时下通行的学科领域进行处理，而是根据诸位同仁的学术专长、根据此次所辑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若干篇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历史所教师劳作的产物，也一并收录。这些成果中有些已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有的则是作者提供的近作。如果这些作品能得到学界各位师友、各位同仁的关注、批评与指正，将不胜欣慰与荣幸！

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到《华中国学》的编辑出版，我们要深深感谢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学界前辈、学校领导和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对人文学科的关心、爱护、支持与扶持。我校国学研究院成立庆典举行于 2009 年 4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先生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为参加这一活动，退掉原先订好的返程机票，重新订票，赶回学校时已是凌晨，并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做了主题讲话；校党委书记路钢教授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高屋建瓴、热情洋溢的致辞；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授因 11 日要赴京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遴选，于 10 日专门打电话到我家中对国学研究院成立表示祝贺，并对他不能与会表示歉意；原校党委副书记、对我校文科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刘献君教授更是全程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教授，原西北大学校长、哲学家、历史学家张岂之教

授，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家朱雷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家萧汉明教授，武汉大学语言学家宗福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历史学家熊德基教授等近 70 名著名专家学者或发来贺信，或莅临大会发表重要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电能源学家张勇传先生则欣然为国学研究院题写了院名。没有他们各种形式的关心与支持，我校人文学科是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一局面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德高望重、具有非凡人格力量的学界前辈，一位深具战略眼光和充满人文情怀的教育家，一位一辈子并不以人文学科为工作对象但又时时刻刻对人文学科念兹在兹、一往情深的卓越科学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杨先生毕生耕耘于机械工程领域，在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研究中，特别是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均有独创性的贡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居功甚伟，1991 年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对人文学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始终倾注了满腔的热忱，真正是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形式予以关心和支持。除前述参加国学院成立大会的感人事迹外，杨先生为本辑刊的出版所展现的人格风范、人文情怀与高尚情操更使我们增添了难以言表的感戴之情。卷首这篇 3500 字的“总序”是杨先生在抱病卧床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完成的，其间数易其稿，初稿及二稿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文字。须知，先生已是 81 岁的老人，且此类不情之请不仅不是他应做的工作，也为撰写“总序”时的健康状态所不容许，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先生独特的人格风范、宽广无私的胸襟、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古道热肠实在是摄人心魄，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华中国学》得以顺利出版，还得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姜新祺先生，以及策划编辑周小方女士和钱坤先生，没有他（她）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热爱以及注重发展本校人文学科的情怀，这套辑刊纳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并如期问世，是不可能的。此外，辑刊的执行主编、历史研究所夏增民博士在论文整理归类、规范体例、编辑文本以及联系出版事宜等诸多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修订



目录

Contents

【总论】

国学的名义及现代意义····· 刘韶军 (1)

【专题论文】

古音构拟的一个问题····· 金理新 (23)

上古汉语“词类活用”的本质与产生环境····· 杨荣祥 (31)

东汉语料与词汇史研究刍议····· 方一新 (47)

魏晋“血”语义场及类型学研究····· 龙 丹 (53)

敦煌诗词曲口语词考探····· 洪 帅 杨永龙 (59)

段玉裁与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 王云路 (67)

山西方言地名及姓氏之“解”研究····· 李小平 (75)

《触蓍说赵太后》三本异文之比较····· 汪维辉 (81)

《法显传校注》辨疑五则····· 张生汉 (93)

《李师师外传》创作年代考辨····· 李裕民 (101)

明世宗经筵日讲阶段性特征述论····· 谢贵安 (107)

明清二爷孙

——从嘉万到康乾的历史轨迹初探····· 高春平 (119)

周易八卦爻辞新译解····· 郑张尚芳 (131)

天、地、人三位一体：韩愈的宇宙本体观念

——兼论中国古代宇宙本体理论的三大系统及其发展演变··刘真伦 (147)

朱熹论经、传·····曹海东 (163)

中国传统生命心灵的物性境界：从文化到诗学·····郑春兰 张宏辉 (183)

20世纪明代诗歌研究综论·····左东岭 (189)

【序跋】

黄树先教授《循理书院志》序·····罗家祥 (211)

正清本源，翻对唐梵

——《〈大唐众经音义〉校注》前言·····黄仁瑄 (217)

【书评】

从《上古汉语音系》到《上古音略》

——金理新教授的上古音研究·····黄树先 (229)

探索求真 新见叠出

——读金理新《上古音略》·····周及徐 (233)

从国学经典中汲取修辞学营养

——沈谦《〈文心雕龙〉与现代修辞学》评介·····冯广艺 (241)



国学的名义及现代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 刘韶军

一定要把国学进行严格的合乎形式逻辑的定义与划分，把国学与现代学术严格区分开来，否则国学将不是国学，只能变成不伦不类的名词，讲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东西，而现代学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也无法在学术研究和教育制度中得以贯彻，学术研究也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

近现代以来，人们对于“国学”^①这个名词的理解千差万别，很多人对“国学”下定义，但没有使大家对“国学是什么？”的问题形成一致的看法。学术的根本精神是求真。所谓真，谓事物本来的真实面目，通过学术研究以求真，最忌只凭主观感觉发表意见，因此学术研究必须凭借真实可靠的证据与合乎逻辑的论证以形成结论。

中国古代学术又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神。辨谓分辨，考谓考察，章、镜，则皆谓明。学术之明辨，是指学术不同类别之间的横向辨析，源流之考察，则是学术发展史上源流关系的纵向梳理。学术欲求真，当然必须包括这种纵向横向的考察辨析，所谓“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细致区分事物在类别和源流上的差别，以求准确界定事物并形成相应的科学概念，这是学术的基本工夫。

今天要来探讨国学问题，未对“国学”概念辨析清楚，则一切谈论难免歧路，因此我们需要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夫，为国学概念做正名的工作，确定它的内涵与外延，然后才能进一步探讨国学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一 国学概念的内涵外延

孔子：“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天必须首先为“国学”做好“正名”工作，“国学”这个“名”如果得不到“正”解，关于国学的“言”论，就会“不顺”，即所“言”皆为基于感觉和印象的意见，而不是合乎逻辑的科学结论。“言”即“不顺”，“事”即“不成”。人们讨论国学，本欲传承弘扬国学中的有益成分来为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做出贡献，但若仍不能正确确定国学是什么，则会对国学的解读不得要领，这个愿望又岂能实现呢？

“正名”是中国古代学者的说法，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古代的学术已经转变为现代的学术，人们就很少使用“正名”的说法了，通行的是形式逻辑学的说法，即所谓对概念进行界定。形式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人们在学术层面对事物进行研究和认识，其思维必须遵守形式逻辑规定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以求正确地论证思想和表达思想，否则就会在研究的推理和论证中产生错误，得出的结论也不会正确。孔子没有学过形式逻辑，虽然他的“必也正名”的思想与形式逻辑不谋而合，但是若要正确地做到正名，则必须借助于形式逻辑。

金岳霖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告诉我们：“概念明确，是正确思维的首要条件。没有明确的概念，就不会有恰当的判断，就不会有合乎逻辑的推理和论证。”^②孔子所说的“正名”，就是要求达到逻辑学所说“概念明确”，孔子所说的“言顺”，就是逻辑学所说“正确思维”、“恰当的判断”、“合乎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二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对于人们的思维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遵守的。

什么是“概念明确”？孔子不是形式逻辑学家，对此没有说明，形式逻辑认为：所谓一个概念的明确，就是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明确。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反映了哪些特有属性与表示了哪些事物，这两者都是明确的。

根据形式逻辑的规定，概念的内涵，就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概念的外延，就是

① 除了国学，还有国粹、中学、国故等名称，这里不一一辨析各名的含义，只就国学一名展开分析。

② 金岳霖.形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

具有这些特有属性的事物，外延表示哪些事物属于这个概念。对于“国学”这个概念，怎样才能把它的内涵和外延确定下来呢？这里可以根据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反比规律，来使用“概念的限制法”，即用逐渐增多概念的内涵的方法，来逐渐减少概念的外延，由此逐渐把国学的内涵和外延确定下来。

如果不对国学的内涵做任何限制，就可以说“国学是学术”，这是毋庸置疑的最基本的内涵，但也是外延最大而限制条件最少的内涵，还远远不能揭示国学的特有属性。国学是学术，表明它不是政治、经济，这是非常明显的，不需要解释。国学作为学术，也不是文化。文化概念大于学术概念，这两个概念不是全同关系，而是上下属关系。文化概念的外延很多，学术只是它的外延之一。学术是文化的核心之一，但不是整个文化本身。国学还与反映其他一些事物的概念相关，人们在讨论国学问题时，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这里先讨论国学是什么，后面再来说明国学不是什么，目的都是使国学概念的内涵、外延明确和准确。

仅仅说“国学是学术”还非常笼统，不能具体反映国学概念的特有属性。学术与国学，这两个概念也是上下属关系，学术是国学的上属概念，它是属概念，国学是学术的下属概念，它是种概念。学术这个属概念下面除了国学这一个种概念之外，还包涵更多的种概念，也就是说除了国学之外，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学术是它属下的种概念。这些种概念，都是学术概念的外延，相互之间又有复杂关系，不能替代。如国学和西学，都是学术这个属概念之下的种概念；二者都是学术的外延，相互不能替代。

仅仅把国学定义为学术，其概念的内涵最少，外延最多，不能准确反映国学的特有属性。要使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更为明确和准确，就要采取增加国学内涵而减少其外延的方法，这个方法从语言表达的方面说，就是增加限制词的方法。用这个办法对国学概念可以逐渐增加限制词，首先应该把国学限制为：“国学是中国的学术。”

从字面的意义上看，国学也应该是“中国的学术”，因为它不是西学。但仅说“中国的学术”还不够，因为这个说法至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二是指“关于中国的学术”。应该把它限定为前者而不是后者。同理，西学也有两种理解：①西方人所从事的学术，②关于西方的学术。在与国学相比较时，所谓的西学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对这两个概念必须先做这样的规定，才不会引起误解。

西方人研究中国的学术称为 Sinology，这是西学的外延而不是国学的外延。同理，中国的学术系统中也有关于西方的学术，如世界史、外国文学、西方哲学等，它们是中国学术的外延，而不是西学的外延。中国人把 Sinology 译为“汉学”或“中国学”，但要与国学严格区分。日本人不是西方人，但对中国一直都有专门研究，明治维新时，日本人全盘接受西学及其中 Sinology 的学术观念、方法和体系，使他们的学术从传统走向了现代，因此西学中的 Sinology 应该包括日本人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总之，广义的 Sinology 当指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或地区的人士研究中国的学术，虽然所研究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事情，但都不能划入国学范畴。

把国学限制为“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仍不能完全反映国学概念的特有属性，因为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在不同的时代则有根本性的差别，具有不同的特有属性，故要视为不同的学术。因此，对国学概念还要从时间上加以限制。

中国学术在古代的不同时期有着一定的发展变化，如先秦、汉代、魏晋、隋唐、宋明、清代等时期的学术，在不断传承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而各有其特点，但这些

历史时期中虽然也有外来学术的传入，如东汉以后传入的印度佛教学术，明清时期传入的部分西方学术，但它们并未造成中国学术的性质的改变，故在整体上属于古代学术，而不属于近代或现代学术。只到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晚清民初，由于中国与西方列强诸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关系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性质的学术也随之而逐步传入中国，这都是中国古代各时期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得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背景下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学术，当然也不例外。中国人数千年来所从事的自成一统的学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了一场古代各时期不曾有过的巨变。这个过程与巨变，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来说，既不情愿也不顺利，但还是逐步承认了西方学术的先进，通过自我怀疑、否定与批判，最终全面接受了现代西方学术，从而使此前的中国学术转变成了现代中国学术，也就使中国学术有了古代学术和现代学术之分，二者的特有属性完全不同。

从时间上对“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进行限制后，就使国学概念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学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这种根本变迁，使国学概念的内涵多了一个限制而使其外延更少，因此能使国学概念更加明确地、准确地反映它要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辨析至此，就可以为国学概念做出明确而清晰的定义了。其完整的表述是：

国学，就是现代西学传入之前的古代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

按照逻辑学的说法，这个定义中的“国学”是被定义项，“就是”是定义联项，其后的文字则是定义项。这样定义国学，比笼统地说“国学是中国固有之学或中国传统学术”更为明晰和准确，而且符合形式逻辑的“属加种差”定义方法：在一个属下，可以有几个种。b种不同于其他种的那些属性，就叫做b种的种差。属加种差的定义，就是定义项是由属与种差组成的定义。

在属加种差的定义法中，“学术”是属，“国学”是“学术”属下的一个种，若拿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比较，其间的种差就是“中国人所从事的”。但中国学术还有古代学术与现代学术之分，其间种差就是“现代西学传入之前的古代中国人”。将这些种差综合起来，就是国学与西学和现代中国学术的种差，再把这个种差与“学术”的属相加，就是“国学”的定义。

要完整了解一个概念，不能只定义它的内涵，还要明确它的外延，应当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来检验这个概念是否正确。概念的内涵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外延反映哪些事物具有这些特有属性，亦即哪些事物属于这个概念。明确概念内涵，使用定义的方法；要明确概念外延，则用划分的方法。如果一个概念只指一个单独的事物，它的外延就是单一的，不需要划分，但更多的概念的外延涵盖许多事物，甚至是无穷多的事物，就要用划分法，把这些事物分成几个小类。这些事物同属一个大类，划分就是在这个大类之下分成几个小类。大类称为属，小类则是这个属下的种，大类或属是划分的母项，小类或种则是划分的子项。对一次划分后的子项，还可以再进行划分，称为连续划分。每一次划分都必须按同一个标准，与另一次划分的标准则不一定相同。划分的标准，可以是一个属性或多个属性。究竟采取哪些属性，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定。划分时要遵守三个规则：①划分的各个子项应当互不相容；②各子项之和必须穷尽母项；③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划分标准进行。我们要按以上的规定来分析国学概念外延所属的事物及其分类。

现代西学传入之前的古代中国人所从事的学术，究竟包括哪些事物？今天的人们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古代中国人从事学术的实际情况，只能通过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之后形

成并传留下来的相关成果来了解之。这些成果，为行文方便而简称为古代学术成果。

古代学术成果作为著作与文章，在形式上与现代学术研究成果有三个根本区别：①使用古代中国语言中的文言撰写而成。②其著作和文章的形式与今天的学术著作和文章不同；正因为这些论著所用的语言及撰述形式都与现代中国学术的论著不同，且都是由古代中国学者所撰成，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古籍”。③古代学术成果的分类与现代学术成果的分类不同。

以下根据这三点不同，来看国学外延的范围。就学术成果的书写语言来讲，中国古代学者使用书面语言——文言撰写著作与文章，这是不争的事实，是国学学术成果最具特征的特点，是与现代中国学术明显区别的标志。文言是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书面语言，它除了与现代中国语言有根本不同之外，本身也有深浅之分，如辜鸿铭所说：

文言或书面汉语……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种类。传教士们曾把书面汉语划分为简易文理的和繁难文理的两类。但我认为，这个分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看来，合理的分法应当是简单欠修辞的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可以称它们为普通会话的或日常事务用语、低级古典汉语、高级古典汉语。^①

不管怎样分，文言有着简易和繁难的差别，则是人们共同承认的。简易与繁难是它们的区别，同时又有雅与俗的区别。如古代的赋和骈文所使用的文言，就比一般的散体文所使用的文言要繁难和优雅。古代帝王的诏书、大臣的奏章上表，常常使用骈体式的文言，所以为皇帝起草文书者都是运用优雅繁难文言比较熟练的文人学者，皇帝往往封他们为翰林。古代还有一些学术著作也用骈文写成，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更多是用骈文撰写书籍的序文，此类最多，如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序》，如佛教著作《出三藏记集》序卷所录各种佛经的序文，都是非常繁难而又特别优雅的文言。

单从繁难角度讲，一些专门领域的著作也很难懂，如古代的天文历算类的著作，但这种著作往往只是繁难而不够优雅，能全书用骈文写成而且兼具繁难而优雅著作，在古代也不是很多的。

古代中国在书面语言之外也有口头语言，一般称之为“白话”。现代提倡白话文以来，人们往往以为白话就是现代汉语，其实白话也分古代白话和现代白话，现代白话只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分支，也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古代白话又与现代白话有着差别，无论是句式与用语，都有不少差异。如古代的小说，其中既有文言，也有白话，但不完全是当时的白话，而是一种半文半白的语言；在古代一些专门著作与文章中，一般以书面语言为主，但有时也会夹杂当时的白话，如《世说新语》；在古代的一些诗文中，也会夹杂着当时的白话用语，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史者所熟知的。

可知在古代本来就有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分，而且在著作与文章中也是时常混用的，但总体来说，古代学术著作与文章所用的语言是书面语言，是与现代学术成果所用现代汉语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讲国学，对这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应该十分清楚。换言之，如果不是使用古代书面语言撰写的学术著作与文章，就不能称为国学的著作与文章。对于现代学者而言，有人仍能用古代书面语言撰写论著，但已不是纯用古代书面语言撰

^①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黄兴涛,宋小庆,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8-89.